

#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优化\*

何春<sup>1</sup>, 谭啸<sup>1</sup>, 汤凯<sup>2</sup>

(1. 辽宁大学, 沈阳 110036; 2. 郑州大学, 郑州 450001)

**摘要:** 新型城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空间平台。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本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测评体系, 并对“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评。结果表明“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整体新型城镇化水平不高; 不同线路以及同一线路不同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参差不齐; 各节点城市不同方面发展差异较大, 各线路、各城市都存在着“短板效应”。基于此, 提出了通过强优势与补短板相结合, 提升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 推动城市群发展, 发挥区域优势的措施来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关键词:** “一带一路”; 节点城市; 新型城镇化

## 一、引言

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期, 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局面,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旨在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战略。该战略致力于加强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关系, 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 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 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可见, 经济带上的节点城市是“一带一路”的核心组成部分, 是沿线各国进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物理载体<sup>①</sup>。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革命的带动下, 城市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 其发展将成为区域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引擎。所以, 伴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而壮大和崛起的城市, 在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内区域经济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也只有通过与此战略相关的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才能实现<sup>[1]</sup>。换句话说, 中国目前构建的“新型城镇化”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支撑体系。但目前, 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的节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城乡的社会现代化水平较低、

源远流长的区域文化传统萎靡不振, 严重影响了国内“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因此, 开展“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测评, 对于提升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 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鉴于此, 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国内沿线35个节点城市为样本, 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测评体系, 通过对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分析, 针对性地提出消除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竞争力短板, 最大限度地发挥节点城市在“五通”中的作用, 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

## 二、相关文献回顾

城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西班牙城市规划师勒德本索·塞尔达在1867年著作的《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提出的。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 城镇化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目前来看,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的内涵、评价体系以及测度方法三个方面。

### (一) 城镇化的内涵

早期学者对城镇化的定义主要从人口、地域、生活方式、就业结构等某个角度来定义城镇化的。如Kuznets (1989)<sup>[2]</sup>, Todaro (1988)<sup>[3]</sup>, 辜胜阻 (1999)<sup>[4]</sup>认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由农村地区转移到城

作者简介: 何春(1988-), 女, 河南南阳人, 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城市经济; 谭啸(1983-), 男, 辽宁沈阳人, 辽宁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讲师, 研究方向: 城市经济; 汤凯(1985-), 男, 江苏睢宁人, 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

\*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一体化视角的城镇化效率研究”(ZJ2015024), 项目负责人: 谭啸。

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 人民日报, 2015-3-29(4).

镇地区的过程。周加来(2001)则从地域角度提出了城市化是城市地域不断扩张的结果<sup>[5]</sup>。而孙中和(2001)从就业结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的就业由第一产业转向二三产业的过程<sup>[6]</sup>。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学者们又从新的角度去理解城镇化,认为城镇化是一个系统综合的概念,不仅包括城镇人口数量,城镇地区面积,还包括生活方式、城市地区公共服务、城市文明、城市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内容,即新型城镇化(彭红碧,杨峰,2010;胡畔,2012)<sup>[7][8]</sup>。上述研究表明,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具有新的内涵和特征,如在扩大城镇规模的同时,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城镇化的质量(郁建兴、翁翠,2008;刘嘉汉、罗蓉,2011)<sup>[9][10]</sup>;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以GDP增长为目标,要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王发曾,2010)<sup>[11]</sup>,此外,新型城镇化建设还要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叶裕民,焦永利,朱远,2013)<sup>[12]</sup>。由上可知,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更加注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注重城市功能的完善和提升,注重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陆大道,2013)<sup>[13]</sup>。

## (二) 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

城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对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时应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国外具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提出的城镇发展指数(CDI)<sup>[14]</sup>以及城镇指标准则(UIG)<sup>[15]</sup>,均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内容。国内学者最早对城镇化进行定量分析的是叶裕民(2001),她提出了包含人口、经济和基础设施的三大类共12项指标测评城镇化<sup>[16]</sup>。随着对城镇化认识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将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中,如韩增林(2009)<sup>[17]</sup>,陈明星(2009)<sup>[18]</sup>,欧向军(2012)<sup>[19]</sup>根据城镇化的内涵,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构建了城镇化综合测评指标体系。虽然上述学者从多个方面对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镇化指标测评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研究并未充分考虑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即新型城镇化是健康的城镇化,更加注重城乡统筹、更加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这引起部分学者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构建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如俞云峰(2010)<sup>[20]</sup>。可见,城镇化测评指标体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

## (三) 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

对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的方法相对较多,如王家庭、唐袁(2009)<sup>[21]</sup>采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欧向军

(2012)<sup>[19]</sup>,左乃先、白永平、左京(2014)<sup>[22]</sup>,贾琦、运迎霞(2015)<sup>[23]</sup>等采用熵值法,夏南凯、程上(2014)<sup>[24]</sup>,翟超颖、代木林(2014)<sup>[25]</sup>用的是专家赋权法,此外,还有组合赋权法(李静、张平宇,2013)<sup>[26]</sup>,BP神经网络(曹飞,2014)<sup>[27]</sup>,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陈明星,陆大道2009)<sup>[28]</sup>。

既有文献对城镇化水平测度进行了不少研究,取得了良好进展,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由于缺乏权威性的国家规划作为评估依据,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各有侧重,制定的测评体系标准不一,使得各研究成果的可比性较差;另一方面,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省份城市,对“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还尚属空白领域。基于此,本文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依据,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具有较强应用价值的新型城镇化测评指标体系对“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为提升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 三、“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

新型城镇化是在传统城镇化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是一个系统综合的概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新型城镇化作为主要的空间载体,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测评“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补充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短板,提升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 (一) 样本城市选择

本文选取的节点城市是按照《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涉及省份的省会城市,以及明确提到的内陆节点城市和重要港口城市,共35个城市。参考“一带一路”版图,“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条走向,自北向南依次是北线: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主要沿第一亚欧大陆桥分布,中国境内重要节点城市有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银川;中线: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主要沿第二亚欧大陆桥分布,中国境内重要节点城市有:合肥、南昌、长沙、武汉、郑州、西安、重庆、成都、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南线: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部分沿第三亚欧大陆桥分布,中国境内重要节点城市有南昌、昆明、拉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路”,虽然有两条重要走向,但在中国境内并未分支,主要是沿海港口城市,自北向南依次是大连、天津、烟台、青岛、上海、杭州、宁波、福州、泉州、厦门、汕头、深圳、广州、

湛江、海口、三亚。

## (二) 指标选取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就要求农村转移人口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实现农村转移人口真正市民化,这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建设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的要求,遵循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并结合指标选取遵循的系统性、科学性、可获取性原则,我们构建了衡量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六个层面的指标体系<sup>②</sup>。

1.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推动力,一般而言,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水平也比较高。选取的指标有人均GDP、二、三产业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利用外资数额、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2. 人口发展。人口发展是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核心目标,不仅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集聚,也表现为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素质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选取的指标有人口密度、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储蓄余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3. 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主要是指满足居民生活、发展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坚实后盾。选取的指标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客运量、剧场影剧院数、医院卫生院床位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4. 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建设倡导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在指标选取时要反映污染控制、环境建设等内容,本文选取的指标有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烟(粉)尘去除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

5.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衡量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潜力。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提高信息、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实现经济高效、集约地发展。选取的指标有科学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普通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

6. 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本文在城乡统筹方面选取的指标有城镇化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

## (三) 数据来源

文章所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于各市的统计公报。

## (四) 测评方法

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评的方法有很多,目前比较常见的有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目标线性加权法、层次分析法、以及专家赋值法等。相比而言,熵值法具有克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以及多变量间信息重叠的优点,是一种比较客观、全面的评价方法。因此,本文拟采用熵值法对“一带一路”节点城市进行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 1. 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设有 $m$ 个城市, $n$ 项测评指标,则原始指标数据矩阵为

$$X = (x_{ij})_{m \times n}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quad (1)$$

式中, $x_{ij}$ 为第 $i$ 个城市 $j$ 项指标。

### 2. 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消除各指标数据的量纲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公式为:

$$\text{正向指标: } X_{ij} = \frac{X_{ij} - X_j^{\min}}{X_j^{\max} - X_j^{\min}} \quad (2)$$

$$\text{逆向指标: } X_{ij} = \frac{X_j^{\max} - X_{ij}}{X_j^{\max} - X_j^{\min}} \quad (3)$$

式中, $X_{ij}$ 为标准化后的数值, $X_j^{\max}$ 和 $X_j^{\min}$ 分别为 $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 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城市指标值的比值,记为 $P_{ij}$ ,

$$P_{ij} = \frac{X_{ij}}{\sum_{i=1}^m X_{ij}} \quad (4)$$

4.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记为 $H_j$ ,

$$H_j = -K \sum_{i=1}^m P_{ij} \ln(P_{ij}), \text{ 其中, } K = 1/\ln(m) \quad (5)$$

5.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记为 $D_j$ ,

$$D_j = 1 - H_j \quad (6)$$

6. 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记为 $W_j$

$$W_j = \frac{D_j}{\sum_{j=1}^n D_j} \quad (7)$$

<sup>②</sup> 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2014-03-16

7. 计算第  $i$  个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值

$$UC_i = \sum_{j=1}^n W_j X_{ij} \quad (8)$$

$UC_i$  越大, 说明  $i$  城市的新城镇化水平越高。

(五) 指标权重的计算

根据上述指标权重的计算公式, 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 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指标及权重

目标层	标准层	比重%	指标层	比重%	属性
“一带一路” 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	经济发展	25.03	人均 GDP	2.76	正
			第二产业比重	1.42	正
			第三产业比重	2.56	正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1.71	正
			人均利用外资金额	6.49	正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5.59	正
	人口发展	24.12	人口密度	0.88	逆
			职工平均工资	3.46	正
			人均储蓄余额	4.3	正
			城镇失业率	1.91	逆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与人数	6.93	正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与人数	6.64	正
	社会发展	19.51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2.79	正
			每万人剧场影剧院数	3.65	正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7.41	正
			每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张)	1.79	正
			每万人拥有固定电话数	3.88	正
	生态环境	13.15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0.52	逆
			每百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1.27	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84	正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47	正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1.36	正
			每万人绿地面积	8.69	正
	科技创新	18.13	科学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4.01	正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2.25	正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5.87	正
			普通高等学校个数	3.67	正
			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	2.33	正
	城乡统筹	4.57	城镇化率	1.26	正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1.50	逆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			1.80	逆	

四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分析

根据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公式计算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各项指标得分和综合得分状况, 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分项得分和综合得分

城市	经济发展	人口发展	社会发展	生态环境	科技创新	城乡统筹	综合
哈尔滨	3.77	3.43	4.19	3.27	5.07	1.83	21.56
长春	5.22	4.27	4.39	3.81	4.05	1.82	23.56
沈阳	5.97	5.65	5.72	4.11	6.22	2.41	30.08
呼和浩特	6.22	2.24	4.13	2.42	4.34	2.43	21.77
银川	4.06	4.22	6.13	3.79	3.09	2.45	23.74

合肥	4.75	3.74	4.82	4.32	7.70	3.33	28.67
南昌	5.54	3.48	2.99	3.98	7.24	2.38	25.60
长沙	6.89	5.03	4.08	3.30	7.20	3.62	30.12
武汉	7.75	6.35	7.55	3.73	11.63	3.51	40.52
郑州	5.25	4.24	2.46	3.23	6.23	3.66	25.07
西安	5.55	5.18	4.55	3.95	7.39	2.25	28.88
重庆	3.71	14.32	1.05	3.39	4.81	2.09	29.38
成都	6.16	7.36	4.05	3.23	6.12	2.75	29.68
兰州	3.26	4.10	2.87	2.56	5.17	2.18	20.14
西宁	3.12	3.17	4.24	2.77	2.43	3.38	19.11
乌鲁木齐	5.28	4.60	4.53	5.28	5.68	3.74	29.11
南宁	2.57	3.79	2.92	5.67	4.87	0.40	20.22
昆明	5.04	5.49	5.60	3.29	5.99	0.98	26.38
拉萨	5.82	5.28	4.94	3.55	1.75	1.74	23.07
大连	12.77	5.23	4.85	3.76	6.18	1.59	34.39
天津	12.50	10.08	4.16	3.71	11.54	3.90	45.89
烟台	4.85	6.08	3.80	3.50	4.55	2.00	24.78
青岛	7.50	5.92	4.37	4.66	8.24	2.38	33.08
上海	10.74	17.23	8.14	5.60	10.10	3.47	55.27
杭州	8.31	10.05	7.14	3.69	9.66	3.81	42.66
宁波	7.30	8.30	6.80	3.10	6.86	3.92	36.29
福州	4.57	5.12	3.74	3.88	5.81	2.55	25.67
泉州	3.67	3.93	4.03	3.41	4.93	2.79	22.76
厦门	9.48	6.29	5.90	5.60	8.29	3.33	38.89
汕头	1.81	3.15	1.03	3.90	3.06	3.57	16.52
深圳	16.61	15.34	16.43	12.58	10.71	3.73	75.40
广州	8.33	11.78	6.83	7.95	12.85	2.45	50.19
湛江	1.12	3.70	0.88	3.65	2.51	3.14	15.01
海口	4.58	3.51	3.43	4.76	5.04	2.11	23.44
三亚	6.27	3.68	3.07	4.07	5.37	2.31	24.77

(一)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评析

根据表2,将35个节点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划分为较低、一般、较强和强四个等级,并将各线路的节点城市按照等级标准进行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等级划分

线路	较低 ( $UC \leq 20$ )	一般 ( $20 < UC \leq 30$ )	较高 ( $30 < UC \leq 40$ )	高 ( $40 < UC$ )
北线 (5)		4	1	
中线 (11)	1	8	1	1
南线 (3)		3		
一路 (16)	2	5	4	5
合计	3	20	6	6

### 1. 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不高

表3显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不高。在35个样本城市中,高水平的城市仅有6个,占样本总数的17.14%,较高水平的城市也有6个,同样占样本总数的17.14%,一般水平的城市数量最多,有20个,占样本总数的57.14%,较低水平的城市有3个,占样本总数的8.57%。

### 2. 不同线路间新型城镇化水平差距明显

“一带一路”不同线路间新型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具体而言,“一路”上的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较高,较高水平以上的城市占总城市数量的一半以上;北线和中线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次之,分别有一个和两个较高水平的节点城市;南线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弱,其节点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处于一般水平。

### 3. 同一线路不同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参差不齐

根据表2绘制图1,据表2和图1可知,同一线路不同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参差不齐。北线的节点城市,沈阳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得分为30.08,远高于北线平均得分24.14,而东部长春、哈尔滨和西部的呼和浩特和银川均低于平均水平,呈现出一高多低的局面;中线的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平均得分为27.84,武汉的得分为40.52,远高于平均得分,长沙、重庆、成都等城市略高于平均水平,西宁的新型城镇化得分最低,仅为19.11,短板效应明显;南线节点城市较少,各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相差不大;一路上的节点城市虽然整体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局部塌陷状况也比较明显,如深圳、上海、广州城镇化得分在50分以上,而汕头和湛江却在20分以下,差距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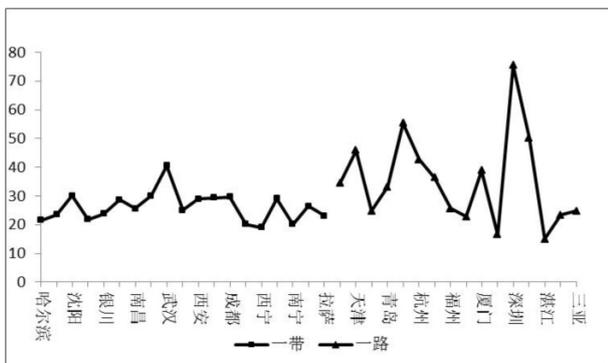


图1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状态图  
(二)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分项竞争力评析

#### 1. 各线路分项竞争力评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 图2显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各分项竞争力示意图。据表2和图2可知,在经济发展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市表现为两端弱中间强态势,如中间的武汉和长沙,武汉凭借其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资源优势成为国内发展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长沙具有的区域、交通、人力资源、生态等六大优势也促使了长沙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后端的南宁发展就比较弱,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南宁的经济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交通的不便、以及人才的匮乏使得南宁在经济发展方面与其他城市还有差距,短板效应明显;人口发展方面,重庆优势比较突出,其余城市相差不大;社会发展方面,前后端城市差距相对较小,中端城市差距明显;生态环境方面,表现为前端弱后端强态势;科技创新方面,前后端城市发展不如中端好,中端的武汉,凭借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位居首位;城乡统筹方面,表现为中前端强,后端弱态势,发展不均衡。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节点城市各分项指标的差距比较大,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短板效应,不利于节点城市向周边地区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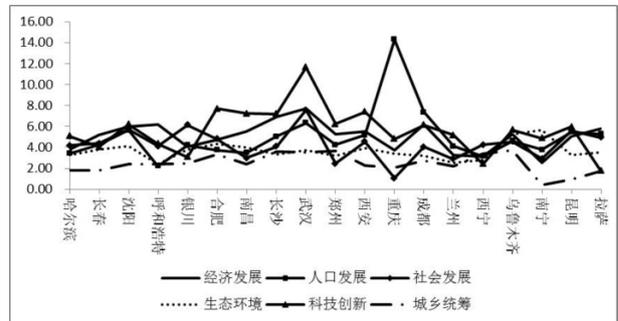


图2 “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市分项竞争力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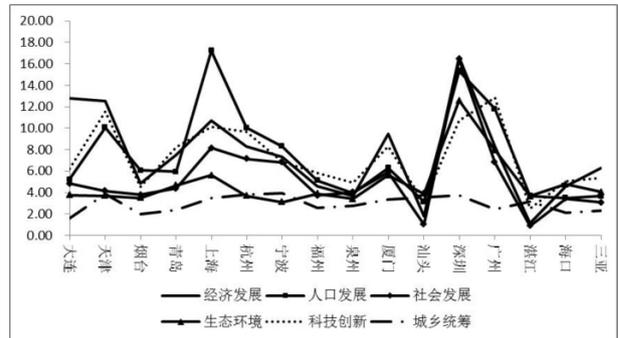


图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  
分项竞争力示意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图3显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各分项竞争力示意图。据表2和图3可知,在经济发展方面,前中端城市发展差距相对较小,后端城市发展差距较大,如深圳以高科技、金融、物流、文化发展起来的新经济模式,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本,经济发展具有持久的动力,发展较好,而远离珠三角的湛江和汕头,受

经济中心的辐射作用较小,发展就相对比较落后;人口发展方面,表现为两端弱中间强态势;社会发展方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和经济发展状况一样,前端弱后端强;生态环境方面,中前端城市发展一般,后端城市发展较好;科技创新方面,中端城市发展差距相对较小,前后端相对较大;城乡统筹方面,各节点城市相差不大,发展比较均衡。可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各分项指标差异明显,尤其是湛江和汕头,多项指标落后,短板效应明显,不利于海上丝绸之路整体效应的发挥。

## 2. 节点城市自身分项竞争力比较评析

由表2可知,“一带一路”各节点城市内部发展也不均衡,如重庆,在人口发展方面,竞争力得分为14.32,位居首位,而在社会发展方面,竞争力得分仅为1.05,位居末位,长短板之间差距非常大;南宁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城乡统筹方面则显得要弱一些;而上海在人口发展和城乡统筹方面的竞争力差距表现的比较明显。各节点城市内部竞争力的不均衡不仅会影响到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而且会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产生影响<sup>[29]</sup>。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根据《愿景和行动》,按照“一带一路”走向选取了中国境内35个样本城市进行了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整体新型城镇化水平不高,而且在不同线路之间、同一线路不同城市之间新型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不利于整体效应的发挥。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要比“丝绸之路经济带”三条线路节点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中线节点城市中,武汉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而西宁的却最低,存在着新型城镇化水平“塌陷”。在各节点城市自身新型城镇化水平构成中,短板效应同样存在,如深圳在经济发展方面较好,在城乡统筹方面却一般,存在着短板效应。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发起国和倡导国,在战略的实施中起着领头羊的重要作用。但国内“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不高、发展不均衡,严重影响了节点城市以及经济带对周边的辐射带动能力。因此,为提高节点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打造节点城市的互联互通网络,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城市之间、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文章提出了如下的对策建议。

(一) 强优势与补短板相结合,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

“一带一路”上各节点城市都存在着独有的“长板”和“短板”,在强化节点城市优势的同时要着力消除“短板”,防止“木桶效应”。如重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此外,经济优势、人才优势、产业优势也是重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长板,但重庆是典型的山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而且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短板,因此,重庆应该重点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好的生活环境,降低农村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门槛,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湛江虽然是国内首批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但近期受国家政策影响小,又远离珠三角经济圈,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落后,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软肋。湛江应该依托资源优势,建立起完备、高效的钢铁产业链,将优质的重工业产能输送出去,建立现代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强湛江与东南亚沿“带”沿“路”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提升湛江的经济实力,进而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sup>[30]</sup>。

(二) 推动城市群发展,驱动“一带一路”经济振兴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一带一路”建设要充分发挥城市群的作用。在现有的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发展基础上,还要推动新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如建立以兰州、西安、银川为中心的西北城市群,借助兰州的能源优势、西安的交通优势、宁夏的人文优势等,发挥城市间的互联互动、取长补短,提升整个城市群的影响力。此外,还要建立以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南宁为中心的西南城市群。根据资源基础、区位条件引导西南地区的人口和产业合理流动,完善城市群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提升西南城市群的整体实力,增强西南城市群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辐射力<sup>③</sup>。

(三) 发挥区域优势,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各区域应该抓住政策机遇,充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实施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西北地区资源丰富,生态基础好,作为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应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交流和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的文化、物流、交通中心。东北地区应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努力开拓边贸市场,加强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西南地区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关联的枢纽区

③ 孙贵宝委员 “一带一路”要重点建设西北地区城市群 [R/OL], 网易新闻, 2016-03-10.

位,经济、旅游优势比较突出,应以“成渝经济带”为中心,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内陆地区的产业基础较好,人才资源丰富,应依托城市群间的互动合作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建立中欧铁路运输,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沿海港口城市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撑,应加快天津滨海新区、上海自贸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等的建设和发展,着力消除对外贸易中存在的机制壁垒,加强对外贸易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 参考文献:

[1]吴乐,霍丽. 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市的空间联系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 2015, 45(6): 111-118.

[2]库兹涅茨·S. 现代经济增长: 速度、结构与扩展[M]. 戴睿,易诚,译.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53.

[3]托达罗·M·P.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 于同申,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336.

[4]辜胜阻. 非农化及城镇化理论与实践[M].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6.

[5]周加来. 城市化·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城市化概念辨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1(5): 40-44.

[6]孙中和. 中国城市化基本内涵与动力机制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01(11): 38-43.

[7]彭红碧,杨峰.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与内涵[J]. 理论探索, 2010(4): 75-78.

[8]胡畔. 任重道远: 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看新型城镇化[J]. 城市发展研究, 2012, 19(7): 29-35.

[9]郁建兴,翁翠.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中的地方政府——基于宁波市江北区的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38(6): 41-48.

[10]刘嘉汉,罗蓉. 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J]. 经济学家, 2011(5): 82-88.

[11]王发曾. 中原经济区的新型城镇化之路[J]. 经济地理, 2010, 30(12): 1972-1977.

[12]叶裕民,焦永利,朱远. 统筹城乡发展框架下的政府职能转变路径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3(5): 118-127.

[13]陆大道. 地理学关于城镇化领域的研究内容框架[J]. 地理科学, 2013, 33(8): 897-901.

[14]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eport 2001 [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02.

[15]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 Urban Indicators

Guideliners [C].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 Programm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04: 8-9.

[16]叶裕民. 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01(7): 27-31.

[17]韩增林,刘天宝.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J]. 地理研究, 2009, 28(06): 1508-1515.

[18]陈明星,陆大道,张华.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 地理学报, 2009, 64(4): 387-398.

[19]欧向军,甄峰,叶磊,等. 江苏省城市化质量的区域差异时空分析[J]. 人文地理, 2012(5): 76-82.

[20]俞云峰. 城乡统筹视角下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浙江城市化水平测算为例[J]. 科学决策, 2010(5): 44-49.

[21]王家庭,唐袁. 我国城市化质量测度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09(12): 127-132.

[22]左乃先,白永平,左京平. 甘肃省城镇化质量测度[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4, 30(10): 1158-1161.

[23]贾琦,运迎霞. 京津冀都市圈城镇化质量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5, 29(3).

[24]夏南凯,程上. 城镇化质量的指数型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J]. 城市规划学刊, 2014(1): 39-45.

[25]翟超颖,代木林. 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的财政政策研究[J]. 财政研究, 2014(12): 79-81.

[26]李静,张平宇. 三江平原垦区城镇化质量测度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14(5): 63-69.

[27]曹飞. 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仿真与提升[J]. 财经科学, 2014(12): 69-78.

[28]陈明星,陆大道,查良松.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J]. 地理研究, 2009, 28(2): 464-474.

[29]高友才,汤凯. “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市竞争力测评及政策建议[J]. 经济学家, 2016(5): 59-67.

[30]汤晓龙.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发展路径研究——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J]. 财经理论研究, 2016(2): 24-29.

(编辑校对: 孙敏 吴洪敏)